

日本汉诗汇编与研究”的意义及走向

李均洋*

摘要:从日本汉诗文本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在汉诗文本的深入研读下,客观科学地分析其思想性和诗美性。既要分析汉诗的“汉”源上去分析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化育,又要从日本汉诗的“和”体上去分析其民族特点,这乃本课题的追求暨力争创新之处。

关键词:日本汉诗; 文本; 汉和特性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运用中国古诗形式所创作的诗歌,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以汉字为载体的日本传统文化暨中日文化互动发展的珍贵遗产。

日本现有的文学史、文化史和语言史著述,都毫无例外地把《古事记》(约712年成书)、《日本书纪》(约720年成书)等奈良时代(710—784)的文本作为典籍加以阐述,而忽视了天平胜宝3年(751)编讫的《怀风藻》诗集在文学史、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上的开创性。

日本文学史上,“诗文”与“倭歌”是两个相对的称谓¹，“诗文”即汉诗文,“倭歌”即用日语文字所创作的诗歌,也称“和歌”。《万叶集》为最早的“倭”(和)歌集,约编撰于8世纪20年代至8世纪末或9世纪初。可诗文就不同了,《怀风藻序》写道:“檀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模弘远,夙古以来,未之有也。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纛无为,岩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遊。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自兹以降,词人间出……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²

这段序言可视为自传说中的“檀原(位于今奈良县)建邦”即古代国家的创立至《怀风藻》编讫的751年间日本列岛的人文历史。其中的“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是指《宋书·倭国传》所记载的“倭王讚”(约5世纪前期)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

* 李均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广岛大学特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本汉诗汇编与研究》(批准号:16JJD750021)开题研讨会的主旨发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本汉诗汇编与研究》(批准号:16JJD750021)2016年6月30日申请立项,2020年12月31日完成研究计划结项。

的知识人王仁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书籍。从此，日本列岛从蒙昧步入了文字文明社会。也就是说，汉字成为日本列岛唯一记事交流、文化教育的文字³。日本史学家认为，“联系稻荷山铁剑铭文上‘辛亥年’（471年）等115文字，《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些天皇家历史和正式编纂时最原始的‘原帝纪’、‘原旧辞’史料，当是471年115文字等相当于钦明朝（实际不存在的天皇名字，是奈良朝的史官们杜撰的）前后的史料。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于545年前后着手编撰国史，日本列岛的倭国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前后，着手历史书的编纂。这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王权国家意识的形成。”⁴这也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原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所指出的“汉字同日本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成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⁵的历史依据。从此，在日本列岛“倭”（和）民族和“倭”（和）国家意识下，思想文化上如《怀风藻序》所言，“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即日本列岛“倭”（和）民族推广孔子儒家的学风，普遍学习孔子儒家的学问。这可以说是日本汉诗的文字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根底。

清末俞樾的《东瀛诗选》（内选150余位诗人的5000多首汉诗，1883年编讫，1884年在日本出版）首开中国学人编辑并评论日本汉诗先河。时隔百年之后的1984年，黄新铭选注《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书目文献出版社）问世，继之有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内选200多位诗人的三百余首汉诗）、李寅生《日本汉诗精品赏析》（中华书局2009年、内选269位诗人500余首汉诗）、李均洋·赵敏俐·佐藤利行主编《正岡子规汉诗索引》（日本东京白帝社2014年、内收2000余首汉诗）、李均洋·佐藤利行主编《菅茶山汉诗研究·全编》（日本东京白帝社2016年、内收中日菅茶山研究著述目录及菅茶山汉诗2413首）等。日本汉诗的研究成果有：肖瑞峰著《日本汉诗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晓平著《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其中有对日本汉诗的专论）、马歌东著《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严明著《花鸟风月的绝唱：日本汉诗的四季歌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蔡毅著《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吴雨平著《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肖瑞峰著《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郭颖著《汉诗与和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均洋·赵敏俐·佐藤利行等合著《日本汉诗研究丛书：菅茶山赖山阳汉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预定出版）等。

广义的日本汉诗不仅包括律诗、绝句、古诗和乐府，也包括词在内。1981年，夏承焘·张怀珍·胡树森编《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中选收日本词若干。2003年，张怀珍《日本三家词笺注》在澳门出版，共收森槐南词95阙、高野竹隐词86阙、森川竹溪词99阙，详加笺注。

从以上先行研究中可以看出,1883 年清末大儒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开启了我国日本汉诗介绍及研究的学术之门,但承接并形成日本汉诗学术研究新局面,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余年间。也就是说,日本汉诗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才进入而立之年。如果说俞樾编选日本汉诗是受日本友人之托的个人行为,那么,改革开放后这 30 余年的日本汉诗学术研究,则是我国运昌盛、中华复兴之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好喜人局面的缩影。介绍研究日本汉诗,是国门洞开,广收包容,以学术文化为媒介国际交流互相认知之必然。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正在于此。在俞樾《东瀛诗选》及近 30 年来选编日本汉诗的先行成果基础上,对日本汉诗进行全貌性的选编,为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奠定权威的系统的的第一手文本汇编。同时,与“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国际交流战略相呼应,对日本汉诗从中日文化交流及中日西(欧美西方诸国)文化交流的视野进行研究,从日本汉诗这一文本中观照中国文化走出去即在海外的影响及西方文化在日本并经日本传入我国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正如近代一首日本汉诗所咏唱的:“手书汉字口和言,头学西洋断发新。非和非汉非洋处,即是风流骨董人。”(三岛中洲《戏作》、1871 年)所谓“风流骨董人”,即日本文化吸收融会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而立于近代世界文化之林。

也就是说,本课题的意义,是要通过对日本汉诗这一文本的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化育效用及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哺效用,为新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提供历史的及现实的共识认知。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文献

一、日本汉诗文献汇编

1.1 《怀风藻》(约 751 年成书)、《凌云集》(约 814 年成书)、《文华秀丽集》(约 818 年成书)、《经国集》(约 827 年成书)、《本朝丽草》(约 1010 年成书)、《和汉朗咏集》(约 1013 年成书)等奈良、平安时代(710~1185)日本汉诗汇编。

1.2 《蕉坚稿》(绝海中津诗文集、室町初期刊)、《空华集》(义堂周信著、约 1368 年刊)等镰仓、室町时代(1185~1602)日本汉诗汇编。

1.3 《日本诗选》(1774 年刊)、《采风集》(1808 年刊)、《海内才子诗》(1820 年刊)、《熙朝诗荟》(1847 年刊)、《摄东七家诗抄》(1849 年刊)、《摄西六家诗抄》(1849 年刊)等江户时代(1602~1868)日本汉诗汇编。

1.4 《明治三十八家绝句》(1871 年刊)、《明治十家绝句》(1878 年刊)、《旧雨诗抄》(1876 年刊)、《春涛诗抄》(1912 年刊)、《敬宇诗集》(1926 年刊)、《松心榭诗抄》(1935 年刊)、《青厓诗存》(1975 年刊)、《三岛中洲诗全释》(2007 年刊)等明治、

大正、昭和时代(1868~1989)日本汉诗汇编。

1.5 历代日本汉诗人汉诗手稿选编

二、日本汉诗研究结构

2.1 奈良·平安时代(710~1185)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

2.2 镰仓·室町时代(1185~1602)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

2.3 江户时代(1602~1868)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和兰学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

2.4 明治·大正·昭和时代(1868~1989)日本汉诗的世界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内容

一、借鉴俞樾《东瀛诗选》的选诗体例及 30 多年来我国日本汉诗的研究成果，首先汇编以下各卷日本汉诗：第一卷——《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汉诗选》；第二卷——《镰仓·室町时代日本汉诗选》；第三卷——《江户时代日本汉诗选》；第四卷——《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汉诗选》；第五卷——《历代日本汉诗人汉诗手稿选编》。各卷字数不等，总量约 200 万字。

二、从比较文化的视野，分以下四个时期对日本汉诗进行研究。

(1)奈良·平安时代(710~1185)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化育”不是指单向的影响，而是指日本汉诗这一本体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自在地生发出的思想内含及诗美特性。就奈良、平安时代研究背景而言，这一时期同中国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典籍和人员交流。集中体现在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交流上。

(2)镰仓·室町时代(1185~1602)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研究背景为，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典籍更加丰富，人员交流则主要是日本五山僧人同南宋、元、明(万历年)的交流。

(3)江户时代(1602~1868)日本汉诗的中国文化和兰学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研究背景是，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典籍在日本相当普及，朱子学成了江户幕府政权治国理政的指导性思想，同时这一时期兰学传入了日本。所谓兰学，是指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欧洲科学技术及学术文化。

(4)明治·大正·昭和时代(1868~1989)日本汉诗的世界文化化育及民族特性研究。研究背景为，随着明治维新，日本一跃而步入世界列强之列，明治年代由清朝来日本的留学生之众堪称中日人员交流之新高。接下来的“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战争使中日交流蒙上了阴影。战后中日民间交流日益加深，1972年9月，中日恢复了外交关系。1978年8月，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

在此基础上，对以下难点问题进行研究。

一、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汉诗的总体特点及汉诗成就，尤其是贵族文化占统治地位下的中国文化的化育及汉诗的日本民族特性。

二、镰仓·室町时代日本汉诗的总体特点及汉诗成就，尤其是武士文化占统治地位下的中国文化化育及汉诗的民族特性。

三、江户时代日本汉诗的总体特点及汉诗成就，尤其是三百年安宁背景下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及兰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的化育下日本汉诗的民族特性。

四、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汉诗的总体特点及汉诗成就，尤其是貌似西化、动荡不安及战后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的世界文化化育及汉诗的民族特性。

总之，一切从日本汉诗文本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在汉诗文本的深入研读下，客观科学地分析其思想性和诗美性。既要从汉诗的“汉”源上去分析中国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化育，又要从日本汉诗的“和”体上去分析其民族特点，这乃本课题的追求暨力争创新之处。

注释

1 林罗山在为平安时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菅原道真（845—903）所写的传记《菅丞相传》中写道：“右大臣……平生所咏倭歌曰菅家御集，其诗文曰菅家文章，其在宰府所著诗文曰菅家后集。御集一卷，文章十二卷，后集三卷。”《林罗山文集》上卷，东京：ペリかん社 1979年，第425页

2 江口孝夫译注《怀风藻》，东京：讲谈社 2000年版，第24—33页

3 1968年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有“辛亥年（471）七月”等115字铭文，铭记着日本列岛“获加多支鹵大王”等人名及相关事项。参见小林芳规著『図説 日本の漢字』，东京：大修館書店 1998年初版，第21页

4 和田萃著『大系 日本の歴史（2）古墳の時代』，东京：小学館 1988年第1版，第295页

5 上田正昭「漢字文化の受容と展開」、上田正昭编『古代の日本と渡来文化』，东京：学生社 1997年4月初版第24页